

中国第十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 张艳玲 王政武

8月26—27日,中国第十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本次研讨会主题为“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关雪凌教授,广西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沈德海分别为开幕式致辞,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胡钧,广西社科院寿思华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文健康与公共福利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佩斯大学原学术副校长、终身教授陈社英分别作主旨报告。胡钧教授作学术总结,沈德海代表主办单位致闭幕辞。

关雪凌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在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问题建立相关制度和机制,在实现经济的同时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沈德海指出,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要关注、关切社会发展现实问题,服务人民最期盼和最迫切的需要,服务经济社会改革和科学发展的需要,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发挥好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决策参考作用,让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脉搏,聚焦人民期盼,确保经济发展成果共享于民、普惠于民、发展于民。

胡钧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其彰显出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单纯是党工作的价值取向,也是发展的同时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它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线和核心内容。

“我们的任务是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根本动力,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胡钧说。

寿思华认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把握方向为人民、为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政治方向,决不能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思想主导。走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讲政治。

“我们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学,是为了能很好地利用其中符合科学的东西。讨论政治经济学,必须对发展生产力进行思辨。”他强调。

陈社英认为,光讲效率和生产力,不讲公平和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公共经济学能更深入、更清楚地分析和规范政府社会经济活动和行为,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加社会福利,调整生产关系中的不合理成分,保证经济发展的最大社会效益和可持续性,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发展,这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趋同。

“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将有助于全面彻底完成政府职能转型,克服市场失灵以及分配不均,更好地认识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解决经济国家时代因极端经济化所形成的各种‘社会顽疾’。”他说。

与会代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等议题进行讨论。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参与,利用市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情况下,建立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妥善处理人民的利益与资本收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

与会代表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关键要使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得到落实,把社会生产目的与生产过程相结合、生产力发展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建立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发展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逻辑起点。

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广西社科联主办,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基地、《改革与战略》杂志社承办,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近40家单位约80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纪念“一带一路”倡议四周年暨“一带一路”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 裴磊

8月26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一带一路”专业委员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省区域经济研究会等共同主办的“纪念‘一带一路’倡议四周年暨‘一带一路’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日本龙谷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兰州财经大学、成都市社科联(院)、河西学院、陇东学院等国内外研究机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孙久文教授、《改革》传媒发行人王佳宁先生、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兼“一带一路”专业委员会主任白永秀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冯宗宪教授分别围绕“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一带一路”建设的走向判断、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设想、“一带一路”空间经济研究等主题作了演讲。

与会专家还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非对称性和战略决策要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合规风险控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讨。

▶▶▶ [上接 01版]

超越计划和市场二元语境 构建信息时代协同经济新模式

■ 易方

信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进一步促使生产高度社会化,必然要求财产权突破原有的私有还是公有的界定,走向“由社会直接占有和直接管理”。我国经济已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表明了我国产权制度必须坚持社会化改革方向。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淡化国企和民企的概念,建议将企业重新分成商业竞争类,公共基础类和公益服务类。对同一类别的企业,不论国有还是私有,实行同一的法律和政策监管,同时享受相同的政策待遇,有利于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企业采用免费或低费微利运营模式向更大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基础服务。

其实恩格斯早就预料到“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册438页)。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没有互联网,他们设想的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并管理的生产力也不可能蒸汽机和电气化阶段实现。只有进入信息生产力时代,这个新型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因为互联网既不适合私人独占,也不适合国家垄断,而是必须“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832页)。而互联网的开放共享、扁平关联精神就是以联合个人为核心的“协同经济”模式的接生婆和助产士。

主要参考文献:

- 1、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中国社出版社1995
- 2、詹慕斯·德雷克《信息简史》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 3、乔治·吉尔德《知识与权力》中信出版社2011
- 4、纽曼·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5、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6、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7、叶航等《超越经济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 8、杨培芳《挽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完)

“影响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之三 影响中国统计事业的经济学家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在国家统计局担任过局长的历任领导几乎都是经济学家,他们对统计事业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行政职务影响,二是统计学术影响。

着这个核心,孙治方对加强统计工作,改进统计工作提出过许多卓越的见解。他在患病垂危的时刻,还关怀统计体制的改革,向中央提出“统计要独立”的建议。孙治方提出改革统计管理体制,实行集中统一,保障统计工作的独立性;提出完善统计法规,建议制订《统计法》;提出统计工作重点放在统计报表、普查、抽样调查方面;提出既要重视物质财富的统计,更要重视效益与劳动效率统计,注重生产和积累、消费的比例关系;提出利润指标作为计划中心指标;建议在宪法上明确统计的监督职能,强调统计的监督作用;提出重视数理统计工作应用,搞统计一定要用数理统计。孙治方的统计思想对我国统计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思华(1904—1978)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为党做起了统计工作。抗战胜利后,王思华受党的派遣进入东北,1947年底以后任东北统计局局长,负责东北地区《计划经济》月刊编辑工作。他在东北任统计局长期间,在缺乏统计工作经验和资料,条件又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首先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东北全区的规模统计工作,并通过对哈尔滨市工商业的调查,研究了资本主义在东北的发展情况,组织整理了解放前东北地区的经济资料,编印了《伪满时东北经济统计资料》。他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理论建设,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从北京、上海等地招聘了一批知识分子,从事统计工作。在他的建议下,东北人民大学开设了统计专修科,后又举办了专职统计干部轮训班,他亲自讲课多次。他主编出版的《新统计学概论》《工业统计学教程》《社会经济统计辞典》《论人口调查》等统计丛书,后来都成为全国统计干部的学习材料。他还根据在东北从事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写了《三年来东北统计工作总结》,这些措施和资料为提高我国统计工作的准确性、及时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东北成立统计局,王思华任局长。在1951年,在全国财经统计会上,王思华积极建议成立中央统计局,任命为全国统计局副局长。1952年王思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主管全国工业统计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和薛暮桥、孙治方等一起为社会主义统计建设,更好地发挥统计工作的作用做出了贡献。他认为,“统计是一种全面性、业务性很强的专业工作,统计工作者首先要学习计划、熟悉计划是怎样制定的。其次是统计指标、统计范围、计算方法、计算价格都要认真学习”;并强调提出:“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最后落实到业务上”。1961年,王思华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建立国家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统计观察和统计监督,建议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重视。此后,中国统计工作走上规范道路,在全国建立起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王思华对统计事业的影响很大。

张心一(1897—1992)是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他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教书时,深感缺乏农业统计资料之苦,便立志开展全国的农业调查统计工作。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统计处,他应邀担任农业统计科长,就想一方设法搞全国性的农业普查。为此,他找到了一个聘请全国性报告员的办法,在全国23个省、600多个县内聘请了1700多名农情报告员,建立起“农情报告”制度。他根据这些报告表,结合各县的人口、土地、面积等数据估算出各省和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进行经济预测,从而建立起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系统较科学的农业统计工作。张心一还利用这些资料对一些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写成了专题论文,如《中国人口的估计》,首次估计当时中国人口为4.5亿人,得到了社会公认。他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农业概况》一书,以较详实的数据和图表反映出全国25个省的农业基本情况,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葛德石认为这本书在当时“不但是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好的农业估计数值”。他在这一时期的著述,直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史的珍贵资料。张心一从事的农业调查统计,开创了我国近代农业统计工作的先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戴世光(1908—1999)是我国20世纪最杰出的统计学家之一。他的一生,既是近代中国统计科学发展的缩影,又是一部新中国统计学教育发展史。1979年,《中国统计》刊发戴世光的论文《积极发展科学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立即在统计学界产生震动,并由此引起统计学界长达十年的争鸣。在这篇论文中,戴世光批判了统计学界长期以来受“苏联统计学”的禁锢而忽视作为“通用方法论科学”——数理统计学的状况,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乃是统计科学应用的理论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冲破了长期以来无人敢涉足的禁区,重新肯定了数理统计的地位,对我国数理统计学乃至整个统计学的发展,对中国探索建立大统计学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上世纪80年代,戴世光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和专业著述,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最初理论基础。特别是1980年《国民收入统计方法论》和《国民收入经济核算理论的发展——综合性生产抑或限制性生产》两篇文章,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接轨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53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直至1999年逝世,戴世光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统计学人才。

杨坚白(1911—2004)于1951年至1954年秋在东北统计局工作,历任东北统计局秘书长、副局长;1954年调国家统计局,主持国民收入计算和综合平衡工作。他首创新中国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全面完整论述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主张加强统计监督,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统计监督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杨坚白发表的论著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统计相关。国民收入和综合平衡统计,一直是杨坚白研究的主要领域。早年,他就提出既然在社会主义下还存在着商品生产,所以整个国民收入及其一切要素,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形式,都要借价值加以计量并用货币表现出来。1983年后,他的《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中国国民收入实证分析》等著作,杨坚白构建了一套关于国民收入和综合平衡的理论体系。

李成瑞(1921—2017)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主要著作有《财政、信贷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人口地图集》《中国分类(地区)模型生命》《社会经济学原理教程》等。李成瑞对统计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可持续发展统计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问题以及我国新统计体系问题所做的探索。

钱伯海(1928—2004)是我国统计界著名学者,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权威及学术带头人。首创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被广泛应用。他直接创建和主持创建的《国民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民经济统计学》、《企业经济统计学》,得到了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重视和确认。他为我国统计学、经济学的发展和统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贺铿(1942—)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无论是在高校还是政府工作部门都关注和大力推进中国统计事业的发展,是中国大统计学思想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在校工作的12年中,正值统计学科和统计专业处于转轨时期,他力主改革,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如拓宽统计学的研究方向,将单一的经济统计学方向扩展为社会经济统计、数理统计、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计量分析和统计核算自动化五个方向。“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科学,社会经济统计对于认识社会经济问题有效,但离不开抽样调查等数理统计的方法;反之,也需要统计在研究社会现象、自然现象时,也需要面对指标如何设置、口径如何设定等社会经济统计的方法和内容。”贺铿的统计思想影响较广。

曾五一(1953—)的研究领域是国民经济核算、经济统计理论与方法、经济数量分析。他坚持在经济统计领域长期耕耘,厚积薄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全国最具学术影响的经济统计学者之一。曾五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开展研究,许多成果直接为改进与完善我国的政府统计工作提供了参考。